

巴勒斯坦移民连任议会多数党领袖 有望当柏林市长的萨利赫

相关链接

新机场一再延迟 市长支持率大跌

柏林市长兼勃兰登堡机场监事会主席克劳斯·沃维莱特年初宣布，柏林新机场建设再遭波折，启用日期延迟至2014年之后，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市长发言人伯恩哈德称，新机场这次推迟启用的原因还是老问题：消防安全系统不符合验收标准。

新机场的所有权分属于勃兰登堡州和德国联邦政府，而工程的反复拖延让德国政府和项目负责人颜面尽失。市长沃维莱特也因此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民调显示，这位原本很受欢迎的市长支持率大幅下滑。

新机场的规划始于1989年，那时柏林墙倒塌不久，东西柏林尚未统一。一些德国官员开始设想建造大型新机场和铁路枢纽来连接东欧和西欧，并且首次提供直飞亚洲和北美的航班。

新机场建设预算耗资大约20亿欧元，最早预计2008年完工。在多次延迟后，新机场定于2012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耗资超过40亿欧元。

在启用前几周，由于航站楼消防安全系统出现技术缺陷，新机场突然宣布原计划再次延迟。没过多久，在2013年启用新机场的计划再次作废。从此，机场管理方对新机场何时投入使用再也不作承诺。

他表示无意辞职，但究竟能撑多久，取决于他所属的社民党要不要将他撵走。倒戈声浪已经涌起，但萨利赫并不着急，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萨利赫以移民子弟身份深入德国政治主流，是柏林当下最受欢迎的社民党员，3月以压倒性多数连任柏林议会多数党领袖。虽然他尚未宣布竞选市长宝座，但几乎无疑是社民党头号人选。

目前萨利赫尚有内外两道坎要克服。一道是他需赢得社民党柏林分部的支持，但分部负责人扬·施托斯本人也愿意参选。另一道是他得让柏林人相信，他有能力让柏林更上一层楼，而不是延续当前在各个领域为德国诸邦垫底的角色，尤其是在劳工市场和教育方面。

但不是所有政客对来自移民社会的萨利赫都表示信任。一些社民党成员不时针对萨利赫发表令人不快的言论，比如嘲笑说：“难道我们现在出门得卷个祷告毯吗？”

柏林议会社民党书记、萨利赫的好友托尔斯滕·施奈德说，这些种族主义情绪十分可笑，他眼中的萨利赫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德国社会，“甚至会在车里哼唱德国国歌”。

目前萨利赫的要务是在两个世界里做好平衡，既要去除传统德国选民“非我族裔其心必异”的成见，又要让少数裔族群相信，他确实能为他们谋取福利。

唐韵



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主政13年，眼下正面临政治滑铁卢，可能撑不到2016年任期结束。柏林议会多数党社民党领袖拉伊德·萨利赫（见图），一位来自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移民家庭的子弟，有望因自己的异族背景成为德国大都会首位非裔市长。

大，父亲在面包店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萨利赫的职业生涯起步于汉堡店，先是炸薯条，接着升为收银员，不久主持后厨事务，继而成为分店股东，最终从政。他中学毕业后曾修读大学医科，但很快终止学业。后来他和两个朋友成立一家媒体机构，经营至今。

萨利赫的经历在他的童年伙伴中并不典型。他的成长环境是柏林最令人头痛的区域，约80%家庭依靠社会福利。“你知道这里的投票率是多少？只有35%。”他说。

萨利赫一直致力于关注一个长期遭忽略的群体：像他一样来自土耳其或阿拉伯家庭的移民，希望他

们能更多地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维护自身利益，而非自我放逐。如果他们有更多受教育和工作机会，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将得到极大提升。

“我从16岁就开始工作。”萨利赫说，“父母始终认为，要尽一切可能自力更生。”他相信，这种人生态度应当从小培养，将来步入劳动力市场时才不至于惊慌失措，而那些早年即有独立精神的人将来会成为社民党的支持者。

内外两道坎

由于国库失血，新机场完工遥遥无期，加上亲信逃税，现任柏林市长沃维莱特的日子很不好过。虽然

非主流出身

一个周五晚上，萨利赫乘坐自己的豪华轿车，来到城郊劳工阶级聚集区施潘道。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社会阶层来说，这里都处于主流边缘，却是萨利赫童年生活的地方。

汽车在一座体育馆前停下，萨利赫步入其中。里面一片喧嚣，充斥着汗臭味，大约有200人正在馆内不同场地踢足球，有时会比赛到凌晨。扩音器里传来Hip-hop音乐，衣帽间飘着烤香肠的味道。这座体育馆名为“午夜运动”，为土耳其、阿拉伯等40多个族裔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压马路之外的新去处。

36岁的萨利赫是目前社民党内最有希望角逐柏林市长的候选人。他和“午夜运动”的许多人熟识，因为他和他们一样，来自贫穷的少数族裔家庭，有8个兄弟姐妹。他认为，这些人正在翻开德国社会民主新一页，“如今移民问题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期”。

柏林人口结构已然发生变化，18岁以下柏林人中，45%有移民血统。2018至2019学年入学的移民儿童将开始多于德国血统的儿童。随着人口迅速增长，移民迟早要在政治舞台上发出更强音。

被忽略群体

萨利赫在人口密集的施潘道长

相关链接

性侵未成年人 美国“零容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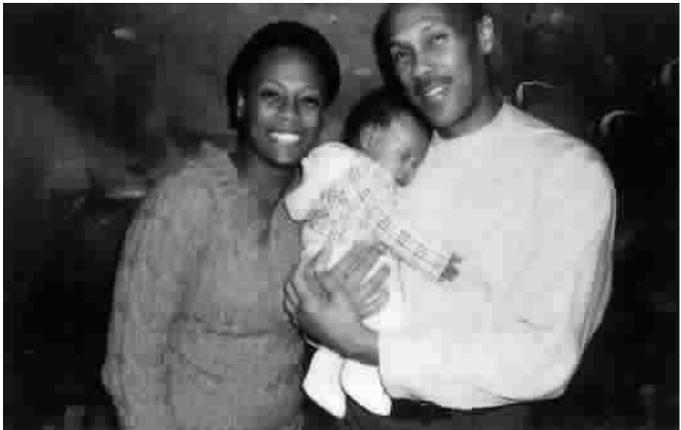
美国对性侵未成年人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凡是和16岁以下少年儿童发生性关系者，一概会被视为强奸罪。不管当时情况如何，也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成年人与未成年少年儿童发生性关系，有人举报并提起诉讼，一旦确认属实，成年当事人就会被判强奸罪。哪怕这个未成年人是性交易工作者，与成年当事人有交易关系，也照判强奸罪。

在美国，任何人一旦被定罪为性侵少年儿童，即便刑满出狱后，也要被长期监视居住。

1994年，美国7岁小女孩梅根·坎卡被邻居残忍性侵犯并杀害，而这个邻居正是一个出狱不久、已经有过两次前科的性罪犯。梅根失踪89天后，新泽西州长签署美国第一个“梅根法”，强制居住在新泽西州内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记。

1996年5月17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联邦“梅根法”，要求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必须向所住各州执法机关登记，执法机关应将性罪犯的资料公之于众。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美国司法部网站，轻松查询到自己居住的区域登记有哪些有性侵案底的危险分子，包括他们的姓名、照片、住址和所犯罪行等详细资料。

儿时被母亲逼迫诬告父亲强奸 美国女子多年翻供无门



钱妮亚年初带儿子探监时和父亲达利尔合影 本版图片 GJ

1998年，时年9岁的钱妮亚·凯利走上证人席，谎称父亲达利尔强暴了她，达利尔因此被判刑40年。

《纽约杂志》近日撰文称，十多年来钱妮亚对父亲心怀愧疚，如今她最想做的就是收回那份证词，让含冤入狱的父亲获释。

谎称“他碰我了”

钱妮亚和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们曾幸福地住在一起，但1997年秋天，钱妮亚的母亲查蕾德先开始吸食可卡因，并靠卖淫挣钱，父亲达利尔也染上了毒瘾。从此，父母争吵，母亲离家出走成了家常便饭。

那年10月的一天，放学回家的钱妮亚在起居室看父亲修电器，随后回到二楼卧室。突然，母亲醉醺醺地冲进来：“你刚刚去哪了？”“在起居室。”“你确定没有跟你爸爸呆在浴室？他有没有碰你？”钱妮亚被母亲怪异的举动吓到了，小声回答：“没有。”但母亲并不罢休，抽出一根

皮带：“他有没有碰你！说实话！”“没有，没有……”在母亲一再逼问下，钱妮亚最终松了口：“他碰我了。”

后来，查蕾德带钱妮亚去诊所，钱妮亚亲口对护士说父亲强暴了自己。于是，诊所通知了儿童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又报了警。

父亲获刑40年

几天后，钱妮亚的父亲达利尔被带到警局。托马斯·曼奇奈里警长对他说，钱妮亚称被父亲强暴了。

莫须有的指控让达利尔一头雾水。“那为什么你女儿大腿和屁股上有你的指纹？”“也许在我睡觉时，我妻子抓着我的手弄上去的？”“你女

儿嘴里为什么有你的精液？”“也许我妻子趁我睡觉时跟我做爱，然后弄了些在女儿身上？”达利尔有问必答，没有意识到警方在诱供，也不知道请律师。最终警方给他安上三项罪名：强奸、肛交和性虐待。

1998年6月，法院启动对达利尔的审判，钱妮亚作为证人出庭，表现得像个成年人，用大人才会用的单词讲述父亲“强奸”自己的过程。而第二个走上证人席的查蕾德说，她认为丈夫没有犯罪。但检控官表示，查蕾德的翻供无关紧要。

审判持续了一周，在没有目击证人，没有DNA证据，甚至医学鉴定结果显示钱妮亚处女膜完整、无

任何明显性侵证据的情况下，达利尔还是被判刑40年。

证词难以收回

父亲入狱后，钱妮亚搬去与外婆同住。六个月后，她将真相告诉外婆，外婆带她去见父亲的律师。1999年9月，法院召开听证会，钱妮亚哭着说自己之前作证时撒了谎，但法官的结论是：“不可信。”

与此同时，达利尔也开始争取出狱机会。他阅读自己的审判材料，寻找可能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但一无所获。除非他认罪并表示悔意，才有可能在2018年获得假释资格。

2011年12月，钱妮亚接到父亲的电话。达利尔说，自己仍在争取出狱，并打算送些文件给州长，“如果你也写信给州长就再好不过”。一个月后，钱妮亚写信给州长，州长办公室将信件转交给总检察长办公室，并最终到了奥兰治县地方检察官弗朗西斯·菲利普斯手中。

2013年年底，菲利普斯发布81页的调查报告，指出钱妮亚“既不能解释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个指控，也没能说明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翻供，甚至不断重复这一指控”。最终结论是：对达利尔的裁决没有错。

对这一结果，钱妮亚并不惊讶。“我只想让你们听我说，绝对没有发生过性侵犯。为什么让你们明白这件事有那么难？” 玖田